

电报的消逝

■ 盖英利

能连职业资格都取得不了。虽然这些都是改革中必然遇到的问题，但是如果不能得到很好处理，势必影响档案馆的稳定，还会成为一种社会问题。所以，对实施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正反两方面的后果，有关管理部门，特别是档案馆的领导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除了事先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外，还要针对不同的对象预先开展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防止矛盾激化，把可能出现的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传统人事管理制度缺陷的形成有其历史的背景，许多档案从业者在那特定的时代为档案事业做出了辛勤的奉献，虽然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和竞争环境中可能其素质达不到取得职业资

上海滩，十里洋场白日的喧嚣已经被夜色覆没，洋楼顶尖的霓虹闪着扑朔迷离的华晕。一个清瘦的背影在黄浦江畔渐行渐远，月光透过茂密的梧桐树叶如银蝶洒落在她那一袭长及脚踝的旗袍上，一双三寸金莲摇曳的步伐是透骨的瘦弱。夜雾漫漫，“嘀嘀嗒嗒”的电报声轻轻地划破夜空的寂静，把我们带到了1908年，带到了坐落在上海外滩上的我国最早的海岸电台——上海无线电报局。

灯火通明的电报大厅里，清一色身着长袍马褂、拖着长辫子的男人一字排开，面对着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发报机正襟危坐。他们是受雇于清政府邮传部的小职员，刚刚受洋人培训结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岗工作。身后的女监工像是当家的婆婆，而这一排拖着长辫子的男人倒像是一群缩手缩脚的小媳妇。他们手指敲击在键盘上发出一道道电波，为当时的中国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这就是电报刚刚进入中国的一个真实情景。

说到电报，不能不想起古时候的信息传递方式，那时要通过一个又一个驿站来转递呀！通常是每60里或80里设置一个驿站。古道上的瘦马西风，扬起了漫天飞舞的黄沙，驿道上奔跑的快马，背负着信札远去。至今甘肃仍沿用诸如武胜驿、岔口驿、沙井驿等古老的地名，就是当年的见证。那是个遥远的锦书难托的年代，“寒灯思旧事，断雁警愁眠。远梦归侵晓，家书到隔年。”寄信人和收信人的焦虑与企盼，只能寄托于马背上的信使。战事也是如此，如果遇到边关告急，最快的传递方法就是点燃一座座烽火台，只是这时千万不要下大雨，万一那雨水浇灭了狼烟，下一座烽火台怎能燃起告急之火啊！岂不愁煞戍边的人。

格证书的标准，或者只能取得较低的职业资格，但是应当避免使他们在心理上、经济上都受到过大的冲击，这是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发展本身的需要，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在实施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过程中应该采取灵活的政策。比如老人用老办法，新人用新办法，合理安排有关人员的工作、学习及待遇，一方面使职业资格认证不偏离大的原则，另一方面又使其能够得到平稳地开展。

参考文献：

（略）

（作者单位：平原大学/河南新乡/45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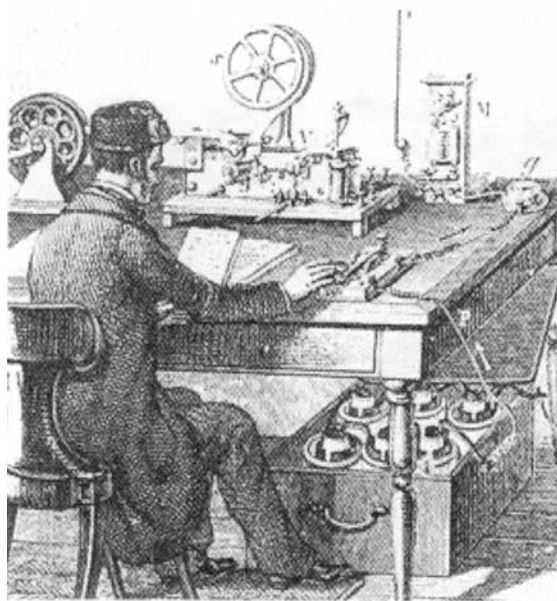
电报刚刚诞生的时候，人们都惊诧地瞪大了眼睛，是那么不可思议，没有快马和驿站，远方的消息怎么就瞬息可达呢？这莫尔斯电码如此神奇，点点划划、“嘀嘀嗒嗒”，瞬间就完成了相互通信，诚如莫尔斯发出的第一份电报所说的：“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而汉字复杂的结构，繁多的字型，一个字一个“面孔”，就不能直接用电码表达了。把电码转换成一组阿拉伯数字再对应一个汉字的方法解决了这一“中国式”的难题，这就是“四码电报”。拍发一组四位数的阿拉伯数字，收报人依靠汉字电码本将其与相应的汉字对应，就完成了电报中的中文信息的传递。而最早编成的第一部汉字电码本《电报新书》，是由1873年法国驻华人员威基杰从《康熙字典》中挑选了6800个常用汉字编成的，后来，我国的郑观应又把它改编为《电报新编》。翻检那一时期的档案史料，办电报局，办电报学堂，敷设电报专线是最红火的事业。李鸿章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就大谈电报的好处，他说：“今线路绵亘万数千里，京外军谋要政瞬息可通，成效昭著，其功实不可没。”

我最初对电报的认识是电报进入寻常百姓家。那时候，送电报是由穿戴绿色衣帽、骑着自行车的邮递员送到收报人家门口的（后来才有了摩托车）。随着“叮铃铃，叮铃铃”清脆的自行车铃声，邮递员高喊：“图章！”“老李家，电报！”李家阿姨就急急忙忙地拿着一盒印泥和图章跑出来，在接收电报的通知单上盖图章，收电报。那封电报是远方的亲戚拍来

的，“某某次车5日9时到兰”。为了省钱，亲戚是用最简洁的语言告诉李家阿姨接站的。那时候在上海等大城市，火车站接人要凭电报才能买到进站的站台票，如果没有电报就只能在出站口眼巴巴地看着亲友大包小包艰难地从车站走出来。当时，除了电报内容之外，收报人的详细地址、门牌号以及收报人姓名，都是要算钱的。因此，发电报前要打草稿，在草稿上翻来覆去地反复修改，可谓字字珠玑，对文字的研究可称为专家了。

我对电报的真实感受是我童年的一个黄昏。那天，我正在窗前出神地看着对面邻居的孩子吃完饭在一圈一圈地舔着饭碗，外面突然传来“突突突”的摩托车声音，我的心一阵“突突”地跳。听到邮递员在喊：“图章！英子家，电报！”爷爷急忙拿着印泥和图章出去，不一会儿，爷爷心情沉重地拿着电报回来了，不知道和奶奶说了些什么，奶奶就开始坐在小板凳上抹眼泪。我想，这份电报带来的一定不是好消息。晚上邻居们都来了，有的送来自家蒸的米糕，有的给爷爷送来几元钱。总之，这份电报来了，大家都不高兴了。第二天我就找不到爷爷的影子了，而且一下子大约一个月才回来。后来我才明白那封电报是说太爷爷病故，让爷爷速归。从那时起，我就一点也不盼望自己家里收到电报，一听到摩托车“突突突”的声音心就“咚咚”地跳。那时候，邮递员把电报送到谁家，左邻右舍就都围上来问长问短。一封电报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凭着一份加急电报，一家有难，八方关切。在我的印象中，电报是“没有大事不登门”，我一般是不盼望家里来电报的。

再后来，我看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党的地下工作者李侠在闷热的阁楼里全神贯注地按动发报键，随着那“嘀嘀嗒嗒”的声音，情报飞过千山万水传到了解放区。在被敌人逮捕的那一刻，他发出的最后一道电波：“永别了，同志们！”深深地震撼了我。通过这部电影我从李侠身上看到了忠诚、正义和勇敢。电报始终贯穿影片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知道了收发报的道理和过程。上小学的时候和同学们玩过电报的游戏，我们在小本子上写一些阿拉伯数字，然后把认识的汉字对应数字的后面，比如，“我”用0111表示，“们”用0112表示……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每个人都把编好的“密电码”抄在本子上面，我们开始写信，收到对方的信后，马上好奇地打开“密电码”进行翻译。一封信完整地翻译完后，接着是欢呼跳跃。那时候的梦想是快点长大，长大后当



一名报务员该有多神气。长大以后没能当上报务员，却听到了一个关于电报的荒诞故事。那是“文革”时期北京的一位老大娘，她在西北工作的儿子要带着名叫兵兵的孙子回北京探亲。老大娘从未见过孙子，高兴劲儿可想而知。那时候发电报一个字要5分钱，我想当时的5分钱恐怕比现在的5元钱还要金贵，所以为了省钱，他给母亲的电报是这样发的：“某日某车带兵进京”。这封电报被居委会带红袖章的老太太们截获，真是如临大敌，立即草木皆兵。她们分析了情况的严重性，第二天就和派出所的公安人员一起到车站堵截。结果可想而知，糊里糊涂地上演了一场闹剧。

多年后，当我偶然翻出一张不知哪一年留下来的电报时，蓦然间，发现电报已经离我们远去了。那一刻，手里捏着那张已经泛黄了的字纸，紧盯着印有阿拉伯数字的打印字和已经褪变了的纯蓝色的墨迹，心里真有股说不清的感慨。真的，不知不觉中电报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淡出了，何时淡出的，连一条界线也没有划出。家庭电话、传呼机、手机、网络一步一步地逼近我们的生活。家里花巨资安装的电话，还有“嘀嘀嘀”的传呼机，还没有被我们温热就受到我们的冷落。现在，我们只要拨通手机，远在天涯如同近在咫尺，信息以光的速度传递着，再不用久久地期盼和等待远方的佳音和消息了。短信成了牵着线的风筝，无论风筝飞到哪里，只要手里牵着这根线彼此就会感受到那份挂念。想到亲友久未谋面了，打开电脑接上视频，在网络里彼此就可以面对面地海阔天空或唠唠家常。你还可以看到那个可爱的稚子在网络对面的房间里跑来跑去，你真的仿佛置身于亲友家中成为他们的



北京—上海相片電報開放紀念

1952.9.10

北京局为纪念1952年9月10日北京—上海开放相片传真电报而发来的纪念照片。

一员。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然而，无形中，“图章”，“老李家，电报！”那熟悉的声音以及由此带来的浓浓的亲情和友情，已经成了遥远的回忆。

曾经独领风骚的电报如今已经落伍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必然要伴随着一些事物的新生和另一些事物的消逝。电报正离我们远去，工业文明正离我们远去，随之而去的也许还有更多的东西。

灯火通明的电报大厅里，清一色身着长袍马褂、拖着长辫子的男人一字排开，面对着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发报机正襟危坐。

